

史札

刁阿农

活跃于曹魏末年的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钟会(225-264)其人,在历史上基本是一个反面人物。《三国志·魏书》本传说: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人,太傅懿之小子也。少敏慧夙成,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正始中以为秘书郎。正始末期高平陵之变以后长期在司马氏手下任职,功劳卓著,屡有升迁。晚年奉司马昭之命率兵伐蜀,得手后图谋自立,实行地方割据或夺取全国政权,但很快败死。当他在司马昭身边时,一再大进谗言,促成了嵇康之死,又欲找阮籍的毛病来陷害于他,未能得手。这两件事加上他的政治野心,给人留下极恶劣的印象。

但他确实很有学问,文章写得也不错,写思想史、文学史不宜完全抹杀其人。《三国志·魏书》本传说,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其文似会。按《隋书·经籍志》著录他的著作有《老子道德经注》二卷、《周易尽神论》一卷、《周易无互体论》三卷,看来他的治学与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正始名士有相近处,他本人与何、王二人也曾有过比较多的接触,可惜他的这些论著都亡佚了。

钟会最著名的论文《四本论》涉及到魏晋之际思想界和人际关系许多问题,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世说新语·文学》云: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康)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於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刘孝标注引《魏志》云:(钟)会论才性异同,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按傅嘏、李丰、王广诸人论才性问题,均在嘉平年间,至甘露初(256),钟

会于诸说之外另树新义,并集而论之。所谓同、异、合、离这样的概括,大约亦出于钟会之手,原来恐怕只是一些分散的意见。此时李、王已先后被杀,傅嘏亦已去世(正元二年,255),此时钟会出来论才性四本,带有做总结的意思,也表明他就是这个领域唯一的权威了。钟会撰《四本论》始毕即至嵇康宅,于户外遥掷之,此事亦即在甘露初;到甘露二年(257)他居丧在家,不久又随司马昭去镇压诸葛诞叛乱,没有时间来讨论理论问题了。

傅嘏的理论主张是兼顺人的品质(性)和才能(才),并认为都应当通过基层去考核,其思考的重点在于贤和能,即性和才不能完全分开来考虑,所以他论同。李、王二说大约强调才、性的不平衡而比较重视才这一面,但一论异一论离,想必仍有相当的差异,可惜今已不得其详了。钟会论才性合的具体意见亦不能详悉,大约与傅嘏有相近处而又有所不同的。《晋书·阮裕传》云: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述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词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叹叹之。

可知论合与论同仍然颇不同。近人论才性四本问题,往往以为论才性同、合者乃党于司马氏的一派,论才性异、离者则是反司马氏的,并进而认为才性问题的辩论乃是当时两派政治势力斗争的密切反映,大力强调四本论的政治意义。这一结论颇有可疑,傅嘏后来固然与司马氏关系密切,但他关心才性问题为时较早,与魏明帝时选举考核办法的讨论有关,而与后来曹与司马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钟会关于才性问题的具体论述既已难知,又何以肯定乃是其政治立场的密切反映呢?

文学家的钟会

何况他也并不忠于司马氏,不久就背叛而去。

性问题与如何考核官员有关,也可以说与政治有关,但这到底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其中必有种种复杂的内容,在材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就将这个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四本变成两本,两军对垒,成为所谓曹氏司马氏两党之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这样的结论下得过于匆忙,难以起信。这样的看法很像是若干年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实形势在历史研究中的投影。

钟会不仅具有理论家的风采,也很擅长文章,多种文体兼善。他的赋以咏物者居多,有《孔雀赋》、《菊花赋》、《蒲萄赋》等等,从今存大抵已颇残缺的文本看去,作风略近于建安辞赋;其中有些民俗材料,颇可注意,例如《菊花赋》中说起菊花的药效:服之者长生,食之者通神,后来晋人作品中也多述此意。由此亦可见陶渊明之东篱采菊并不是追求风雅,而是在做一件很实际、讲功利目的事情。

钟会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檄蜀文》,曾被选入《文选》(卷44)。景元四年(263),镇西将军钟会奉司马昭之命率部出骆谷伐蜀,蜀兵据剑阁之险相距,钟会亲自写这篇文章去做对方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赶快投降。文章写得从容不迫,很有策略,并不剑拔弩张,一派王者之师的高姿态。檄文略云:

今国朝隆天覆之恩,宰辅弘宽恕之德,先惠后诛,好生恶杀。往者吴将孙壹举众内附,位为上司,宠秩殊异。文钦、唐咨为国度大害,叛主隳贼,还为戎首。咨搆逼禽获,欽二子还降,皆将军封侯,沓豫闻国事。壹等穷蹙归命,犹加上宠,况巴蜀贤智见机而作者哉?诚能深鉴成败,遽然高蹈,投迹微

子之踪,措身陈平之轨,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百姓士民,安堵乐业,农不易亩,市不回歸,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计,岂不美与?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虽欲悔之,亦不及也。各具宣布,咸使闻知。

文章中追述远远近近的历史,语重心长地规劝巴蜀贤智弃暗投明,辞气安详,具有动人的力量。本文同先前著名的陈琳檄文相比,没有那种杀气腾腾的气势,是因为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同了,那时势均力敌,胜负难知,而现在可以说是稳操胜券。前人评此文说:诸檄中独此篇浑厚得体。盖兹时蜀已不支,无庸辞费。(闻齐华《文选滄注》卷22引孙鑛评语)。语境不同,立言各异。

钟会还写过不少论,大抵亡佚。他的五卷本《乌落论》仅存若干片段,而仍有精彩的意见,例如

凡人之心,结宜盛不忘衰,达不穷弃,不疑惑于诡构,不信爱于流言,经长历远,久而愈固。而人多初隆而后薄,始密而终疏,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发生于神气,道数乖而不同,权以一时之术,取仓促之利。有贪其财而交,有慕其势而交,有爱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

可以说都是见道之言,而且说得简明有味。钟会本来有条件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可惜最后野心膨胀,迅速走向灭亡。

钟会还写过一篇《母夫人张氏传》,写自己母亲的素养才智,特别是对自己的培养教诲,亲切动人。其中记载母亲对自己的告诫有“谦恭慎密、不能自足,则损在其中矣、人谁能皆体自然,力行不倦,抑亦其次等语。钟会是个聪明人,但后来大约全然忘记了这些庭训,终于身败名裂。

序跋

王干

楚水风情最难忘

《楚水风物》序

书 我仿佛回到了外婆的 澎湖湾,阳光 沙滩 海浪 仙人掌 是南国风情,而风车、田螺、粽箬、虎头鲨则是我亲爱的里下河大地涂抹在我们心灵上永不消褪的 图腾。所以,仁前让我做序,便不再客套,欣然应笔,借此抒发一回对故乡那种超乎人伦之上的亲情至情,并顺祝故乡的土地年年丰沃、故乡的父老乡亲岁岁平安,享乐亦无疆。

刘仁前文笔师从里下河出的 文曲星 汪曾祺先生,行文简畅新丽,善用楚水方言俚语,有些词的选用极见功夫,常令我这个 游子 惊喜而倍感亲切。为文到了这个境地,是不大容易的。

二十四年前,我为刘仁前的《楚水风物》写过一篇序言,如今此书经过修订又要再版,仁前让我再写一序,理由是此书是纪念汪曾祺先生去世20周年才修订重出的。我本拟推托,一想也有道理。当初仁前出版此书,我曾主动帮汪曾祺先生题写书名。汪先生一点没有推托,很快写来,且考虑到封面设计的需要,分别写了横排竖排两种。

汪先生啊!最近看女作家胡娘回忆汪先生夫妇的文章说,每次去汪先生家拜访,汪师母临走总要问要不要去下洗手间,

而最后一次见汪老,汪师母已经生病,临告别,是汪先生有些忐忑地问她,要不要去洗手间。

都说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温暖,为人更是温暖。为刘仁前题写书名的细节,证明他是一个时刻为别人着想的君子。

汪先生开一代文风,流韵深广。刘仁前自拜汪氏为宗师,他最早的散文,后来小说,都是浸润着汪曾祺的血脉,学汪者众,得神韵者寡。刘仁前的《楚水风物》之后,又有刘春龙的《乡村捕韵散记》、刘旭东的《吾乡食物》等新的里下河风物类的小书问世,《楚水风物》再版,正是时候。《楚水风物》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钩沉

姚晟

窃书之辨

钱桂森最为知名的事迹就是被认为曾大量窃取翰林院藏四库进呈本。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广征天下书籍,此后各省督抚送呈进呈,借抄之书以及转呈私家藏书总计达一万三千余种,每种书首叶钤有翰林院印,或翰林院典簿厅关防,满汉文印,首册书衣加盖乾隆年月督抚送到家藏书壹部计书本戳记,这些书称作四库进呈本。《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未经发还的进呈本一直存于翰林院,庚子之变时惨遭兵燹损失殆尽。有学者估计,目前存世的四库进呈本近九百部。吴格从《藏园群书经眼录》、《嘉业堂藏书记》、《中国善本书提要》等辑录整理而成的《钱桂森教经堂藏书知见录》,共收书五十九部,其中四库进呈本达四十部,数量可谓十分惊人,难怪有前辈学者言之凿凿地称钱桂森“窃书”了。

钱桂森“窃书”之说最早源于一九一六年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昔时翰林前辈清秘堂尊者得观藏书,然往往似携官书出。泰州钱君璠在馆最久,精于鉴别,故所携多善本。宣统庚戌(1910)津沽张兰亭至泰州,在钱氏家中掘载十余笈以还,其中钤院印者十有九。

十余年后编撰的《嘉业堂藏书记》中,吴昌绶撰《雪窗集》提要云:钱桂森清秘时,借存之书多被携出,此其一也。董康撰四库存目底本《黄文简公介庵集》提要亦云:书经进呈,发交翰林院清秘阁储待领回,光绪初钱桂森直清秘时携出者。

一九三四年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称留存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日久为翰林书士拿回家去,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法犀童,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转辗流入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则说四库底本《乐府杂记》为钱氏从翰林院

窃出者。这些近代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一致认为钱桂森监守自盗,窃取大量翰林院藏四库进呈本。钱桂森三住蓬山的特殊经历让其在翰林院任职十多年,确实具备“窃书”的客观条件,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妨看看钱桂森的前辈与同僚的说法。

前有法梧门之法式善,仕途经历与钱桂森颇为相似,被认为是“不告而取的健者”。梧门自著《陶庐杂录》载:十年前,余正月游厂,于庙市书摊,得宋元人各集,皆《永乐大典》中散篇采入《四库书》者,宋集三十二种,元集二十三种,统计八百二十三卷。书写不工,似未及校对之本。余维物少见珍,什袭藏之。法式善称其四库底本多是购自厂肆。

除了法式善,钱桂森之外,曾任职翰林院,也藏有四库进呈本者,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有黄宗汉《履斋先生遗集》、《梅岩胡先生文集》、《重刻双溪类稿》、《二妙集》、《方是闲居小稿》、路慎庄《《经典释疑》,今藏陕西省文史馆》、朱学勤《《芳谷文集》、《山窗余稿》、《蓝山集》、《孙明复先生小集》,今藏南京图书馆》、龚昱曾《《云溪集》,今藏厦门图书馆》、周星誉《《宝越集》,今藏山东省图书馆》、沈家本《《南轩易说》、袁芳瑛《《桂林风土记》、《论语笔解》、《四书经疑贯通》、《律吕阐微》、许乃普《《续资治通鉴长编》、《朝野类要》》、缪荃孙《《平江纪事》、《西使记》》等人,其中如路慎庄,藏书多出翰林院及宫内,袁芳瑛也被傅增湘认为在清秘堂时窃携书以出。但无一例外,这些人自称家里的翰林院旧藏,得自厂肆者都。

新疆大学藏明万历刻本《蒲阳黄御史集》,为四库进呈本。从书中朱彭寿题跋可知,此书约在光绪中,从翰林院流出而售于京城书肆,光绪戊戌(1898)被时在京城任职的朱彭寿购藏。又如清华大学藏清康熙抄本《周易阐理》,未有光绪二十九年桂芬跋:光绪癸卯岁来京师,偶于街市以钱五

百购得是书及《遗忠录》、《礼贤录》、《忠献别录》、《龙川别志》等书,皆完善无缺,都为范氏懋柱家藏本,浙江巡抚所进者也。

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均藻》卷末翁同龢手跋云:《四库》开时,四方献书者,经采录后,以原书发还其家。其发而未领者皆储于翰林院。院有灞洲亭五楹,列架比栉。余于咸丰己未(1859)院长命与清秘堂诸公同检书时,插架尚十得六七。后于厂肆往往见散出之本,盖管钥不慎,为隶人所窃也。道光朝中再至,则一空如洗,可胜叹哉。咸丰己未,钱桂森以言事回翰林,应该也参与了检书,得以上手、经眼大量的四库底本,是钱桂森精于版本鉴别的重要原因。

钱桂森自己也有说法,浙江大学藏明正德刻本《上高先生文集》卷首有桂森题识:此翰林院佚出本,辛酉正月朱修伯员外得于琉璃厂火神庙,归以见赠。犀庵记。朱修伯即结庐主人朱学勤,咸丰三年进士,藏书甚富,有《结庐书目》。此书是朱学勤购自厂肆再转赠予钱桂森。

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钱桂森之名,称桂森藏书鲜为人知,其实不确。《藏书纪事诗》不录生存,成稿时钱桂森尚在世。咸丰八年(1858)钱桂森同年,藏书家孙衣言即称桂森“富藏书”。同治七年(1868)孙衣言以普通乾隆刻本《水心文集》跟钱桂森换来珍稀的明正德本《黎刻水心先生文集》。孙氏在两部书上作跋详记此事,盛赞桂森嘉惠士林之举,跋曰:同年钱樵庵侍御,乃有黎本,予以此为我乡先生书,请以今本黎本,侍御不予靳也。孙衣言曾于杭州、京师遍访《杜清献集》而不能得,同治九年(1870)借钱桂森藏明抄本为底本翻刻。光绪丙子(1876)川东道姚勳元致信京中缪荃孙,提到听说钱桂森藏有《类篇》全帙,请缪转借影抄。这些事例足以证明钱桂森藏书并非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而是与当时藏书界保持来往和交流。如果钱氏藏

书中多有来历不明的翰林院旧藏,他怎敢坦荡示人?同样很难想象,一个因爱书而顺手牵羊,监守自盗的人,会大方同意以贱易贵,舍金得将秘藏借人翻刻,化身千百。

因此,我们不仅仅凭钱桂森在翰林院任职时间长,又精鉴别善聚书,藏书中有不少翰林院旧藏,就简单地归结为钱氏“窃书”。自咸丰年间起翰林院藏书的大量外流,实际上是厂肆书贾与院内隶人互相勾结的结果。此类事在清末很常见,如光绪年间执琉璃厂书业之牛耳的正文斋谭锡庆,就以监盗卖内府藏书起家。这些书入翰林院后的经历并非钱桂森自翰林院窃出,散入厂肆,公私购藏,而应该是翰林院隶人窃出,厂肆收购,钱桂森购藏,散出再入厂肆,公私购藏的过程。法式善、钱桂森、朱学勤等文人藏书家因为知道这些善本的价值,不忍其流落而购之藏之,书贾则在两进两出中间赚取了高额利润。

孙衣言尝应钱桂森之请为其赋诗,称犀庵耽于闭门读异书而识见过人,诗云:玉貌先生尚自如,清虚无事闭门居。尊前花石围高馆,帐里烟煤得异书。同辈声名谁早达,后人富贵只才疏。秋风更切将离感,昨日论文最启予。钱桂森门生、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犀庵归隐后作《怀钱辛伯先生扬州》:江南公亦老名士,日下贫如大布衣。锁院律吹丹凤诤,璇窗棋笑石围围。曾陪杖履松筠坞,为道山水水石肥。二十四桥今隐去,竹西无限好斜晖。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十一日,钱桂森在泰州病故,享年七十一岁,葬于姜堰镇三里桥冯家塚。翁同龢得讣怆然,挽之曰:六舟(陈彝)早逝,午桥(张丙炎)又亡,平生江表故人,至吾而尽,训诂精研,词章妙绝,今日儒林旧学,舍此安归。桂森死后数年,善本大多复为京津书贾来泰购去。万卷缥緲,一聚一散,正如烟云之过眼也。

(下)

书话

陈麟德

从一条殿试题目谈起

清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年),殿试策论题为:(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此题不悉出自御制还是军机大臣之手,出得好!好就好在对通过科举行将步入仕途的莘莘文士,当头棒喝,有震慑人心之功。果不其然,是岁山东即墨新科进士登科后旋即派往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督查赈灾工作的李毓昌,察知山阳县王仲汉侵吞赈款,于是立定脚跟,严拒赃官腐蚀拉拢,不意竟遭毒杀而诬以悬梁自尽。嘉庆帝震怒,彻查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元凶授首。百里侯王仲汉之所以身首异处,就是想发财,利令智昏,朝廷命官竟敢在不是葬身鱼腹,就是颠沛流离的灾民身上割肉,伤天害理,人神共愤,国法难容。某君科考,因为道中拾过铜钱一枚为房师所觑以致名落孙山,换来房师七绝一首:一枚铜钱尚动心,要他为官定害民。贪心从此须悔改,未做文章先做人。

早在六百六十多年前,岳武穆就断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清代戴远山也说过:官到能贫才是清。当然,有些朝代为了笼络百官,弄以优渥的待遇。宋朝百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丰厚,月薪饷最高达400贯(一贯为千文),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除俸钱外,还有禄米,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玉食,生活奢华。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5倍以上。所以寇准虽然是清官,却人称豪华宰相,京剧《罢宴》即据此敷衍而成。

在政由贿成官以钱得的中国封建社会,当清官甚难。元好问有诗云:能吏寻常见,廉廉第一难。要想有清望,操守必须坚正廉洁,安贫乐道。要有后汉羊续悬鱼、唐裴宽瘦鹿的精神,拒腐蚀,永不沾,谈何容易。官清则贫,史不绝书。范仲淹,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包拯官位虽高,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袁崇焕含冤遭戮,家无余资,史可法除夕佐饔,取盐鼓下之,被曾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早年为官,肩粮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江南为官,日食粗粥一盂,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郑板桥为官一任,最终只得三头毛驴,驮着铺盖卷儿,书、乐器,罢官回乡仍心安理得,重返扬州卖字画为生。最穷要数海瑞,卒时,金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洪散簪,有寒士所不堪者,于官贫,不能具含殓。其实,居官贫不能葬者何止海瑞,据《咸丰兴化县志·宦绩》载,永乐中任兴化知县的吕童,操守不称。卒于官,囊囊萧然,百姓治棺敛之,巷哭者千人。乡贤,状元宰相,李春芳,虽位至首辅,廉洁自持,愤遣请属,一无所受。《咸丰兴化县志本传》)连为长子营建宅第均无能为力。兴化陈氏五进士之一的以恂公,自平遥致仕归,安贫乐道,衣食不足,恬如也。《咸丰兴化县志本传》)然毕竟安贫乐道与世无伤者寥若晨星,一肩明月两袖清风者则如凤毛麟角,而贪婪无厌,欲望难填,货贿风行,聚敛无度者则比比皆是。即以明清两朝而言,崇祯朝首辅周延儒,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阮大铖,乾隆朝大学士和坤等均富埒天子,气焰熏天,公卿倒屣,国人皆曰可杀,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封建社会末世,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富,明清之世,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至于主昏于上,政清于下者,如在位十年,嗜酒昏狂,淫乱残暴,无故杀人的北齐文宣帝高洋,任用汉族士人杨愔,改定律令,修建长城,出击外族,廓清政治,民心得安,乃是极个别的昙花一现,缺乏典型性。

笔者行文至此,还是回到殿试题目上来,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这几乎成了金科玉律,人必须恪守凛遵,为父母,岂可贪财。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以德治国。喜清贫恶货贿者代济不绝。《旧唐书·崔玄暉传》载崔母语人曰:儿子从宦者,有人来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闻货货充足,衣马轻肥,此恶消息。朱德总司令1937年9月在给前妻陈玉珍的信中明确指出:望升官发财的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之人无妨多来。贵为总司令,身无分文。我为保持了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黄埔军校初建时的对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然而,千里为官只为财,并未销声匿迹,清托抱官时有闻。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看钱面。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于是,受贿、包庇、冤狱,不一而足,东窗事发,悔之晚矣。身后有余忘缩手,跟前无路想回头。因而,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必须要要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铸成铁券丹书,奉为圭臬,永不违规。委权胥吏,百弊蠹起,纱帽不大,贪贿逾亿,小官巨腐,时有所闻,所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